

明代文学论集

上

主 编 陈庆元
副主编 王汉民 涂秀虹



海峡文艺出版社

目 录

诗文研究

士商契合与中唐至明清文学思想的演变·····	陈书录 (3)
史统的发现与树立:明代文学复古的史学背景·····	张德建 (20)
明代诗学辨体理论的尊体意识与典范意识·····	邓新跃 (40)
论明代文学开创小说承前启后的新局面·····	廖楚强 (48)
明代初中期文学格局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许并生 (56)
明代洪武至正德时期的士风与文风·····	刘化兵 (66)
明代诗学对朝鲜汉诗的影响·····	严 明 (76)
明代宣滇文学名家行实及创作述要·····	孙秋克 (91)
明代广东词人综论 ·····	谢永芳 (103)
论明代悼亡诗 ·····	胡 旭 (114)
晋安诗派:万历间福州文人群体对本地域文学的自觉建构 ·····	陈广宏 (125)
《徐霞客研究》创刊十年之文学研究综论·····	曹立波 (158)
试论《四库全书总目》对明文流变的体察及评价 ·····	黎必信 (168)
明代诗文别集数字化状况答问 ·····	徐永明 (182)
白燕与袁凯《白燕》诗 ·····	张稔穰 (194)
解缙诗歌与明初诗风 ·····	吴国富 (205)
于谦的政治品格与他的悲剧命运 ·····	廖可斌 (214)
郑和下西洋与明代海洋文学刍论 ·····	赵君尧 (223)
谢铎交游考 ·····	林家骊 (241)
祝允明诗歌论略 ·····	孙学堂 (251)

- 茶陵派成员考辨 雷 磊 (261)
- 试析李梦阳对《石淙诗稿》的评点 史小军 杨毅鸿 (281)
- 杨慎词学与《草堂诗余》 张宏生 (291)
- 布衣诗客自风流
- 谢榛的生性为人与诗论诗作 石 麟 (310)
- 从岷山社到岷山逸老社 郑礼炬 (319)
- 散文家的诗论
- 王慎中诗序之文浅探 林 虹 (332)
- 《唐宋八大家文钞》与茅坤的文统论 林春虹 (343)
- 汪道昆与嘉、万时期文坛的复古活动
- 以其与七子派关系考察为中心 郑利华 (353)
- 论王世贞的词学观 欧明俊 陈 堃 (379)
- 《焚书》真伪及刊刻过程 许建平 (394)
- 论七子派的“古体宗汉魏”观 陈 斌 (411)
- 胡应麟诗论研究述评 李庆立 崔建利 (422)
- 袁宏道《潇碧堂集》作品系年订疑 何宗美 (438)
- 从袁宏道诗文看晚明苏州城市人文形态 查清华 (450)
- 徐渤著述考 陈庆元 (467)
- 物欲的正视与贪欲的匡正
- 《三言》、《二拍》物欲观论析 宋克夫 (485)
- 重读徐霞客
- 景观审美与写景艺术 夏咸淳 (496)
- 文学视野中的《徐霞客游记》 段江丽 (511)
- 略论明代日用类书中的诗
- 以万历间刊《万用正宗不求人》和《妙锦万宝全书》
- 为考察中心 刘天振 (525)
- 晚明书画风气对张岱文艺思想的影响 张则桐 (538)
- 毛晋校勘学体系考论 任德魁 (546)
- 道德文章相连环 世代累积半边天
- 评徐朔方、孙秋克著《明代文学史》 吴 敢 (559)
- 行乐与游戏
- 陈洪绶《何天章行乐图》及其题咏探论 毛文芳 (570)

明清之际五种诗歌总集佚著序跋辑考 朱则杰 (581)

“悼亡”并非悼妻的专称

——读明代六位女诗人的《悼亡》诗 周明初 (592)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评文》考 孙小力 王浩 (603)

独具匠心的七律批评

——论《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 方盛良 (610)

小说研究

《永乐大典》平话探佚 袁世硕 (623)

口述史小说的演变和功能 董国炎 (629)

神道设教：明清章回小说叙事的民族传统 吴光正 (638)

从白话小说看陆王心学对明代文学的影响 李玉栓 (648)

明代小说读者与通俗小说刊刻之关系阐释 程国赋 (655)

论白话章回小说回目中的常见套语“义释” 上原究一 (668)

明成化词话之包龙图系列论 田若虹 (678)

论日本内阁文库藏清平山堂所刊小说

——以版式与刻字特点为视角 中里见敬 (688)

20 世纪上半期《三国演义》文献研究述略 苗怀明 (709)

关于上海图书馆藏《三国演义》残叶 中川谕 (717)

“连环计”故事嬗变文本的叙事学分析 王丽娟 (728)

《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中的小说观批评 刘海燕 (740)

论多重叙述中的刘备形象 贝京 (748)

论《三国演义》中陈宫的性格悲剧 张淑蓉 (759)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作战指挥艺术 夏旻 (767)

杂于利害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用人治军的失误及启示 郭征帆 (778)

论林冲休妻及其形象 魏文哲 (786)

《水浒传》：市民意识与英雄末路 邵敏 (790)

《水浒传》的“夜化”时空及其叙事特效 李桂奎 (797)

《水浒传》的道教文化意识 陈庆纪 (814)

《水浒传志传评林》“简”在哪里？ 涂秀虹 董宁 (823)

泾河龙转生为何物 大塚秀高 (8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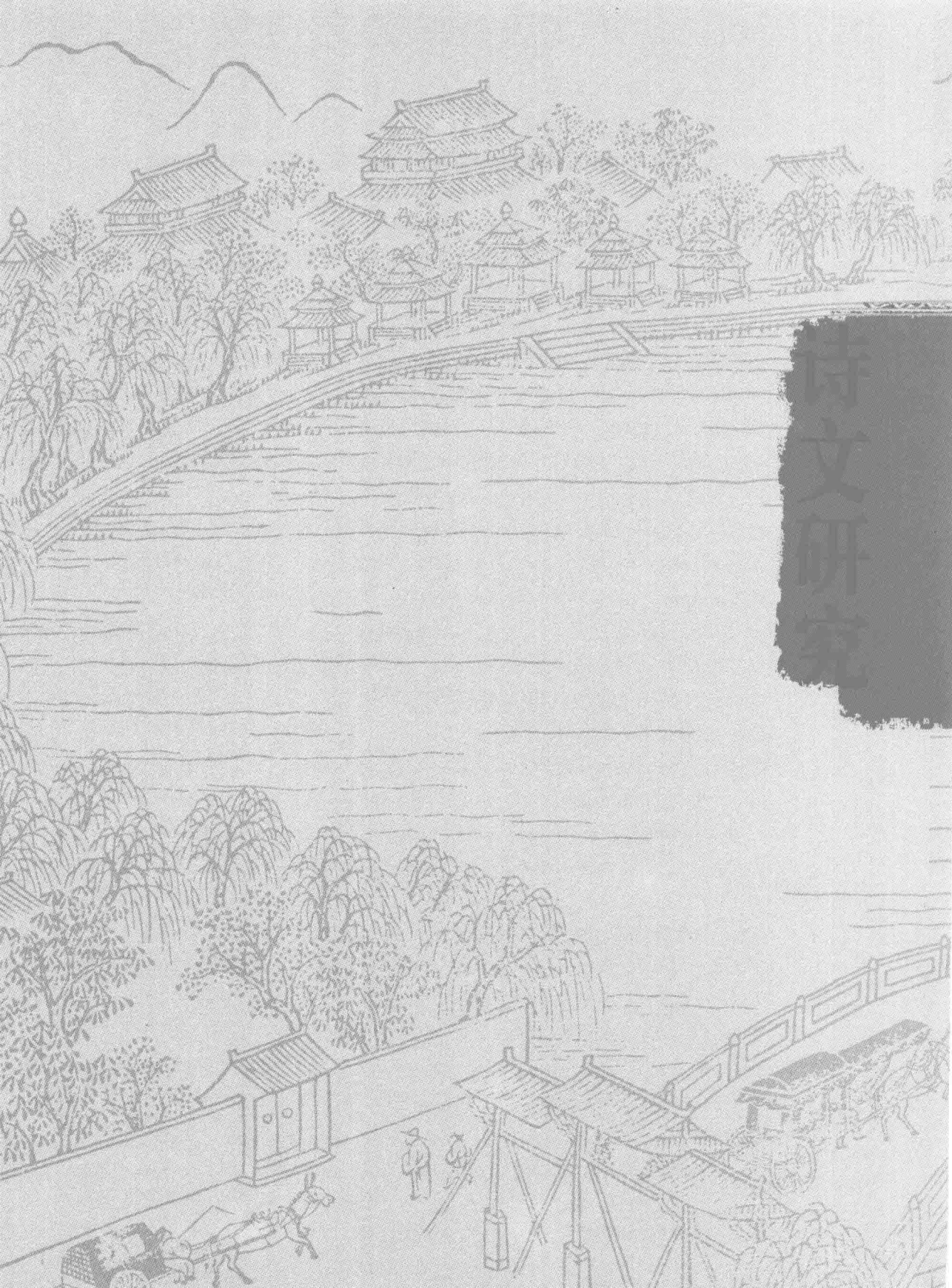
- 闽斋堂本《西游记》试论 胡 胜 (849)
- 民间说唱与《西游记》的生成和传播 纪德君 (858)
- 魔幻“空山”
——《西游记》自然描写的哲思与诗化 周小兵 (867)
- 宗教情怀的形象倾诉
——《西游记》作者笔下的唐僧形象新论 陈弦章 (877)
- 试论《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之形成和其背景
——另一个杨家将故事 松浦智子 (888)
- 《三教开迷归正演义》与三一教 万晴川 (905)
- 明中篇传奇《双双传》的创作时间、作者与其他 陈国军 (924)
- 《平妖传》与民间宗教 段春旭 (931)
- 邓志谟与医药文化
——以《铁树记》、《飞剑记》、《咒枣记》、《山水争奇》
为中心 岩田和子 (939)
- 从“三言二拍”看宋元时期的杭州城 郭 梅 (949)
- 从“二拍”的入话看凌濛初的创作心态 傅承洲 (956)
- 行者的心路历程
——《西游补》人情之旅 陈曼丽 (965)
- 现实与超现实、出世与入世完美地结合
——论《绿野仙踪》的思想内容 曹亦冰 (975)
- 浅论明代的文言小说评点 董玉洪 (985)
- 稗史纠葛中的唐伯虎 马宇辉 (996)
- 数字化在文学专题研究中的应用
——以中国历史地理数字化和古代小说版本数字化为例
..... 周文业 (1003)

戏曲研究

- 试论宋剧体制在元末明初的变化 王 平 (1023)
- 明代人对《西厢记》剧体的体认 伏涤修 (1032)
- 从《李娃传》到《绣襦记》
——看小说戏曲的改编传播轨辙 陶慕宁 (1043)
- 论《西厢记》改本《南西厢记》的改创得失 聂付生 (1054)

康海后期南曲小令创作初探

- 兼论〔浪淘沙〕曲牌的几个问题……………陈毓沅 (1065)
- 论清代杂剧对徐渭《四声猿》的接受……………杜桂萍 (1077)
- 《牡丹亭》情理冲突的表现策略探析……………徐大军 (1093)
- 论罗汝芳对汤显祖的影响……………邹自振 罗伽禄 (1101)
- 戏剧性的加强
- 论“临川四梦”对唐代相关小说的改编……………吕贤平 (1113)
- 汤显祖和净明道……………尹 蓉 (1120)
- 论叶宪祖《鸾镜记》的女性意识……………马珏珩 (1126)
- 冯梦龙、袁于令交游文献新证……………陆 林 (1136)
- 落叶连枝成一梦
- 论晚明女性剧作家叶小纨的《鸳鸯梦》杂剧……………孟 梅 (1144)
- 明末清初“斥魏”小说与“斥魏”戏曲比较研究……………成 敏 (1153)
- 查继佐戏曲活动之遗民心态考论……………欧阳江琳 (1160)
- 《西厢记》“临去秋波”的八股阐释……………王汉民 (1169)
- 编后记…………… (1176)



詩文研究

士商契合与中唐至明清文学思想的演变

○南京师范大学 陈书录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侧重考察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文化背景，而余英时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侧重考察禅宗、道教、儒家伦理与中国近世商人精神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的启发下，我们又在贴近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更新视角，考察中唐以来文学思想演变的经济和文化背景——商业活动和商人伦理，并着力楔入心灵深处，揭示士商契合与文学思想演变之间的内在关系及其意义。

—

早在先秦时期，儒学创始人孔子及其弟子子贡是士商契合的典范。亦儒亦商的子贡不仅是孔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中屈指可数的学有所长者，而且善于预测行情，及时买卖货物，因而家累千金，富比陶朱。更为突出的是，子贡的经商谋利与孔子的游说传道相互结合，相得益彰，将士商契合引入最佳状态：“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① 由于孔子及子贡等人的努力，在早期儒学中

^① 司马迁，《货殖列传》，《史记》卷一二九，第3258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孕育出“义以生利，利以平民”^①的儒商精神。然而，后来在士商关系方面却出现了严重地倒退，这主要是遇到了三大障碍：一是“存义去利”。例如汉代的董仲舒极力主张“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②，这又被后儒引作存义去利、讳言财利的理论根据，并且成为儒士与商贾疏离乃至对立的重要理由。二是“重农抑商”。随着汉武帝时独尊儒术、桑弘羊的“务本（农）抑末（商）”^③和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等主张成为统治思想，朝廷奉行的政策中“重农抑商”的倾向越来越严重。三是“贵士贱商”。《史记·平准书》中说“（汉）高祖（刘邦）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直至唐朝最高统治者也往往视商贾为“贱类”，朝廷要求严格执行商贾“不得入仕”的政策：“士农工商，四人各业。食禄之家，毋得与下人争利。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④统治思想与朝廷政策的双重压力，造成了士与商严重分离和对立的局面。

存义去利、重农抑商、贵士贱商的统治思想与朝廷政策，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乃至文学领域的畸形，因而一批包括文化与文学领域在内的有识之士不断地努力打破这种僵局。

较早力求从儒家伦理道德的层面清除士商契合障碍的是中唐文化与文学领域的代表人物韩愈，他在复兴儒学中重振“义以生利，利以平民”的儒商精神，其观点集中体现在《原道》篇中，其中一方面攘斥佛老，重振儒学，弘扬仁义，所谓“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另一方面强调重农重商，富国利民：“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

① 《左传·成公二年》载孔子言论，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788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

② 班固，《董仲舒传》，《汉书》卷五六，第2524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③ 班固，《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赞曰，《汉书》卷六六，第2903页。

④ 《食货志》，《旧唐书》卷四八，第2089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又，《韦安石传》中记载：“尝于内殿赐宴，（张）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数人于前博戏。安石跪奏曰：‘蜀商等贱类，不合预登此筵。’因顾左右令逐出之，座者皆为失色，（武）则天以安石辞直，深慰勉之。”《旧唐书》卷九二，第2956页。

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①应该说，韩愈在《原道》中所提倡的思想是多方面的，其中承前启后、转旧为新的关键点有二：一是强调士农工商“相生养之道”，在“道”的高度将士农工商四者并重；二是仁义与财利并举，将“仁与义”、“通货财”等融合成儒商精神，后者是长期被人们忽视乃至抹杀的早期儒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显然，这对于扭转“存义去利”、“重农抑商”的风气和促进士商的契合，颇有开创之功和积极意义。而在儒家伦理道德的层面将士商契合推向最高境界的是明中叶“心学”代表人物王阳明。他在为苏州昆山商人方麟所作的《节庵方公墓表》中强调“四民（士农工商）异业同道”，从“同道”的角度强调士商契合。他又说：“果能于此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②我们知道，王阳明的心学是伦理型的理论体系，旨在“以良知指示至善之本体”^③。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儒家伦理道德是“至善”。在王阳明看来，做买卖、做商贾与为圣为贤二者之间并非矛盾而是可以完全统一的，其中的关键是要在“致良知”中“调停得心体无累”，将经商谋利的精神与至善至圣的道德相融合成儒商伦理，从儒家最高道德标准（为圣为贤）上肯定做商贾、做买卖，从而充分强调儒商道德人格的高尚性，将儒商伦理价值推向最高境界，也在儒家伦理道德的层面上“调停”士商关系，将士商契合推向最高的道德境界。

较早要求从朝廷政策变革的层面清除士商契合障碍的是中唐的白居易，他在唐宪宗元和元年（806）为准备应制举而撰写《策林》75篇，其中一方面反对背弃仁义而求利，强调“划革弊法，沙汰奸商”^④；另一方面主张士、农、工、商等“四人（民）”的“和钧”，建议朝廷以轻重政策调节货币、谷帛、财物之间的价格，调节士、农、工、商等“四民”之间的关系，“使百货通流，四人交利”^⑤。显然，他有关朝廷“使百货通流，

① 韩愈著，马其昶校注，《原道》，《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第15～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② 王阳明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三二《补录》，第11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③ 《王阳明全集》卷三三《年谱》，第1254页。

④ 白居易，《策林》二十三《议盐法之弊》，《白居易集》卷六三，第1318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⑤ 白居易，《策林》十九《息游堕》，《白居易集》卷六三，第1311～1312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四人交利”的政策建言，不仅在富国利民的前提下强调发挥商贸的作用，维护商贾的利益，而且有利于扫除士商平等乃至相互契合的障碍。而真正在政策层面上影响朝廷并对“重农抑商”、“贵士贱商”等思想观念形成较大冲击的，是北宋时期的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他们不仅是改革朝廷有关政策的建言者，而且也是改革的实践者。“庆历新政”时期的改革家范仲淹，既力主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又明确指出：“山海之货，本无穷竭，但国家轻变其法，深取于人，商贾不通，财用自困。今须朝廷集议，从长改革，使天下之财通济无滞。”^① 反对“轻变其法”，希望在“从长改革”之中“使天下之财通济无滞”，这颇有政治远见和务实精神。欧阳修不仅积极参预“庆历新政”，而且是北宋诗文革新的主将，他在推行“庆历新政”的前夕作《通进司上书》，其中有云：“至于鬻官入粟，下无应者；改法权货，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万之人，惟取足于西人而已，西人何不为不困！……故臣以谓通漕运、尽地利、权商贾三术并施，则财用足而西人纾，国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② 显然，“商旅不行”的社会现实，是推动“庆历新政”的动因之一；而欧阳修等人推行新政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通漕运、尽地利、权商贾”，这是他以儒士与朝官的双重身份向朝廷献策，为商贾维权，是士与商在变革朝廷政策方面契合的一个突出表现。他又在《送朱职方提举运盐》中“吐策献天子”：“治国如治身，四民就四体，奈何窒其一，无异歛厥趾；工作而商行，本末相表里，臣请通其流，为国扫泥滓。”^③ 显然，他献策所清除的“泥滓”中有“重农抑商”、“贵士贱商”等弊端，这有利于朝廷推行新政，为士商平等乃至契合创造宽松的环境。同时，还不可忽视中唐以后一系列朝政改革的实际作用。先看韩愈、白居易等活跃的中唐，代宗朝有刘晏改革漕运，改革盐政和行常平法，在盐政改革中还鼓励商人以绢代钱杂盐。唐德宗朝宰相杨炎用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其中要求居无定处的行商于所在郡县交纳相当于资财三十分之一的商税。由于两税法扩大了货币征收范围，商业更见繁

① 《答手诏五事》，《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上》，四部丛刊本。

②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四五，第639页，中华书局2001年版。

③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七，第113页，中华书局2001年版。

荣。加之战争造成农民纷纷破产，被迫舍“本”逐“末”，转化成小商小贩，商业也畸形地发展。京师长安商贾云集，城中两市店铺栉比鳞次，数量大增。扬州是南北交通枢纽，麇集大量的客商；成都是西南一带重要商业城市，与扬州处在差不多的地位，时称“扬一益二”。上文已经说到北宋范仲淹、欧阳修等参与的“庆历新政”，其变革的动因之一是“商贾不行”，即商品交流受到阻碍。明代万历前期张居正则强调“农商相资”、互惠互利：“余以为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①他在改革中推行整饬边防及与蒙古通商贸易等措施，所依靠的力量之一是晋商及出身于晋商家庭的官员张四维、王国光等。如此在朝政改革中士商互助，士商互惠，在一定的程度上提高了商贾的经济效益，改善了商贾的社会地位，而社会经济又反作用于社会意识，也有利于转变“重农抑商”、“贵士贱商”等思想观念，乃至明清之际黄宗羲敢于直接抨击世俗的儒生们“以工商为末”的“妄议”，大力倡导“工商皆本”^②的思想，这就在思想观念上将长期被压抑的工商业提升到“本业”的地位，为士商平等乃至契合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较早的心态上与商贾有所契合的是南宋著名诗人陆游，他在《估客乐》诗中表达了“贾乐则士羨”的思想情趣，以商贾的富有与快乐反衬儒士的求进无门、命如纸薄，既有对权贵势要的愤恨，也有对商贾的艳羨，也就是以羡慕之情看待商贾挣脱权贵的束缚而任情地逐利与享乐。正是有这种思想感情的基础，陆游与商贾邂逅相遇而成为知交：“偶逢估客问姓名，欢笑便足为交朋。”^③正是有这种思想感情基础，陆游梦中也向往“为估客”：“信命从来不问天，经旬无酒亦陶然。梦为估客扬州去，《水调》声中月满船。”^④这首诗在对梦幻的追求中展示了士商契合的心态。以后，这类反映士商契合心态的作品时有出现，例如元代富商兼儒士的顾

① 《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张太岳集》卷八，第9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

②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三》：“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41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③ 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夜归》，《剑南诗稿校注》卷一七，第13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④ 陆游著，钱仲联校注，《记梦》，《剑南诗稿校注》卷五〇，第29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瑛的《三二年来，商旅难行，畏途多棘，政以为叹，徐君宪以〈雪景盘车图〉求题，观之风学载道，不能无戚然也，遂为赋云》、明初诗人张华的《送朱道原归京师》等。元明时期尤其是明代以《贾客乐》或《估客乐》为题的诗歌，大多以羡慕的心态写商贾之乐，如张羽的《贾客乐》、胡奎的《估客乐》、李攀龙的《估客乐》、王世贞的《估客乐》、梁辰鱼的《估客乐》、胡应麟的《估客乐二首》和《新估客乐二首》，还有高启的《估客词》、徐贲的《贾客行》、孙蕡的《云南乐》、唐寅的《阊门即事》、梁辰鱼的《襄阳乐》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清时期全国活跃着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徽州商帮等十大商帮的背景下，一些文人如明代出身于陕西商贾家庭的康海、出身于甘肃商贾家庭的李梦阳、出身于晋商家庭的张四维、出身于徽商家庭的汪道昆和清代江西的魏禧、浙江乌程的沈垎等，多为商贾撰写墓志铭、墓表、墓碑、行状等，虽然其中不乏“谀墓”，带有铜臭和庸俗之气，但往往是士商在心灵上契合的重要形态。在这方面，苏州文人同时又为明代中后期文坛盟主的王世贞颇有代表性。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续稿》中为商贾撰写墓志铭（包括墓表、神道碑、墓志铭、墓碑、行状）和传记 60 多篇。他在《处士程有功暨配吴孺人合葬志铭》中说徽商“往往修诗书之业以谋不朽”^①，并在《许长公小传》中赞扬徽州府歙县商人许铎“躬行仁义至死不悔”^②，而又评价苏州商人张冲说：“君读书猎大较，不好为章句，弃之。北走燕，遯其游闲公子日驰章台傍，揆瑟，揄袂，跼蹐，陆博，从耳目，畅心志，衡施舍，盖期年而囊中千金装行尽乃归。”^③可见，王世贞特别在两个方面推崇徽商与苏州商人：一是转修诗书，儒商并行，义利兼顾；二是挣脱束缚，纵情享受，畅舒心志，逍遥自在。也就是说，以上两个方面是王世贞与商贾的契合点。以后，晚明的公安派、竟陵派和清中叶的袁枚等在个体心态的层面与商贾契合不断推向深度。这将在下文进一步论述。

由此可见，中唐以来士商关系的演变，大致是由“贵士贱商”转而在儒家伦理道德层面追求“异业同道”，进而在朝廷政策改革的层面力求消

① 《处士程有功暨配吴孺人合葬志铭》，《弇州山人续稿》卷一一六。

② 《许长公小传》，《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八二。

③ 《张隐君小传》，《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作四。

除“重农抑商”、“贵士贱商”等障碍，直至在个体心态的层面有一定程度上的士商契合。当然，在中唐以来士商关系演变的轨迹中，上述三个阶段中的内涵有时相互区别，有时相互交叉，相互激发，相互推进，形成“合力”。正是由于朝廷政策的变革、儒商伦理道德的重构、个体心态的转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包括商贾在内的市民阶层的壮大等多方面的“合力”作用，逐渐改变着“重农抑商”、“贵士贱商”等思想观念，到明代中后期认为“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①的大有人在。而且，相对于封建正统思想钳制下“贵士贱商”的社会氛围，明代中后期出现了一股“独异”的风气，这就是士商相互赏识、彼此契合，正如归有光所说：“为贾与为学者，异趋也。今为学者，其好则贾而已矣；而为贾者，独为学者之好，岂不异哉！”^②乃至“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③。当然，在这股“独异”的士商“相混”之风中也难免有惟利是图的士（官）商勾结乃至狼狈为奸等丑恶的一面，但也有光明正大、利国利民的一面：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是新的经济因素，包括商贾在内的市民阶层代表着当时先进的社会力量，因而士商在“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思想基础上的契合，是促进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发展的动力。

二

士商在“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思想基础上的契合，不是促进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发展的动力，也是促进文学思想发展的动力。所谓文学思想，一是文学理论批评，一是文学创作，二者的相互交叉，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演变的历程。我们在本节侧重探讨“士商契合”对中唐以来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重商以利国利民的政治主张与复古主义中功利文学观的新变。中唐的韩愈、白居易和北宋的范仲淹、欧阳修等都主张重商以利国利民，这

^① 《赠芝麻识破假形 摘草药巧谐真偶》，《二刻拍案惊奇》卷二九，第5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② 归有光著，《詹仰之墓志铭》，《震川先生文集》卷一九，第4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③ 归有光著，《白庵程瓮八十寿序》，《震川先生文集》卷一三，第3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对于他们以复古为革新的诗文理论颇有影响。韩愈在《答李秀才书》中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①他以古文为明道的手段，是为了提倡古道才写作古文。论者往往认为韩愈力倡文以明道，所明之“道”是古圣贤之道，最主要的就是孔孟的仁义思想，具体表现为攘斥佛老、反对藩镇割据等政治、思想文化上的功利。其实，我们在前文中已结合他的《原道》等加以考察，看到其中还包括士、农、工、商四民“相生养”等经济上的功利。显然，韩愈的文以明道，不仅强调社会功能，为政治教化服务，而且强调经济效益，为富国利民服务。这种功利观的宗旨是在中唐重建和维护李唐封建王朝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的秩序。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也有强烈的功利倾向，他在《与元九书》中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又在《新乐府序》中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这些强调功利的诗歌主张，与他注重士农工商的功利密切相关：“百货通流，四人（民）交利。”简而言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的功利观，直接影响到韩愈、白居易等人强调功利的文学理论。范仲淹既是推动“庆历新政”政治家，又是北宋以复古为诗文革新的前驱，他在针对“商贾不通，财用自困”等弊政，主张“从长改革，使天下之财通济无滞”，同时主张改革政治必须改革文风：“文章之薄，则为君子之忧；风化其坏，则为来者之资。惟圣帝明王，文质相救，在乎己不在乎人。”^②欧阳修在领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厌恶宋初古文领域的怪僻之风，反对文士们“弃百事不关于心”，提倡“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③等观点。这与他们重商以利国利民的观念密切相关：“尝闻商者云，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④显然，中唐韩愈、白居易和北宋范仲淹、欧阳修等儒家“道统”与“写实”文学观中，不仅强调政治、思想文化上的功利，而且强调经济上的功利，反映了包括商贾在内的新兴的市民阶层的利益，后者正是传统的“写实”与“道统”文学观中的新变因素，使中唐与

① 韩愈著，马其昶校注，《答李秀才书》，《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第1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奏上时务书》，《范文正公集》卷七，四部丛刊本。

③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答吴充秀才书》，《欧阳修全集》卷四五，第664页，中华书局2001年版。

④ 《四民诗》，《范文正公集》卷一，四部丛刊本。

北宋以复古为革新的诗文理论中显示出新的生机。毋庸讳言，过分强调功利的文学观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忽略艺术特征和美感作用，在付诸创作实践中有明显的局限性。

二是商贾的忏悔与文人拟古主义自赎中的转向。与中唐和北宋以复古为革新的诗文理论相比，明代中后期的文学复古理论中新变的因素少了，而在格调层面上的模拟的因素多了，与此相关的是在文学创作中出现许多赝古与雷同等弊端，而元明文学中若干忏悔赎罪的商贾形象，则从一个方面促动了拟古主义者在自赎中转向。众所周知，元明文学中出现了若干忏悔赎罪的商贾形象，例如元杂剧《散家财天赐老生儿》中的富商刘从善、《庞居士误放来生债》中的巨商庞蕴、《东堂老劝破家子弟》中的商人之子扬州奴，冯梦龙编撰的“三言”中《桂员外途穷忏悔》中忘恩负义的商人桂迁、《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青年商人蒋兴哥等。《散家财天赐老生儿》第二折中的富商刘从善唱道：“则俺这做经商的一个个非为不道，那些儿善与人交。都是我好贿贪财，今日个折乏的我来除根也那剪草。我今日个散钱波把穷民来济，悔罪波将神灵来告：则待要问天公赎买一个儿。也等我养小来防备老。”诚然，富商刘从善等在财富的积累之中，既有他们的辛劳与智慧，也沾有老百姓的血汗，他们有的在“好贿贪财”、盘剥发家之中带有“原罪”。正因为如此，刘从善要“回心忏悔”，“舍散家财，毁烧文契，改过迁善”。最后，喜得“老生儿”，顺利地解决了家产分割的问题。这从宗教层面来说，带有因果报应的意味；但从现实生活的层面来说，则是生动地反映了富商忏悔的心态及其赎罪的行为。这对元明特别是明代中后期的文人自悔自赎的心态颇有影响，如曾主张文学复古的李梦阳、何景明、康海、徐祯卿、边贡、王九思、王廷相、王慎中、唐顺之、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都有一个从自守到自省的过程。他们的自省乃至自赎，虽然有多种原因，但其中有的受到佛教的忏悔意识的影响，有的则受到商贾忏悔意识的影响。力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李梦阳是明中叶复古派的开创者，又是自省与自赎的先驱。早在正德五年（1510），他就在《庚午除日》诗中写道：“于今将四十，始悟昔年非。”^① 这样的自省与自赎，其动因之一是他深受商贾忏悔意识的

^① 李梦阳，《空同集》卷二三，文渊阁四库全书。